

◎ 王日根/著

# 中国会馆史

ZHONGGUO HUIGUAN SHI

中华文化专题史系列丛书 >>>

◆会馆既凝聚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又颇能因应社会变迁而历久长新。它并不等同与西方的商业基尔特，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态。在明清时期，会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科举制度兴盛和人口流动频繁而兴起，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客地的同籍人自发设置，它成为流动社会中的有效整合工具，显示了其对家族组织的超越和对社会变迁形式的适应和创造，亦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及其限度。

◆本书奠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通过广泛搜罗海内外现存的会馆志、笔记手札等资料，开展实地社会调查，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取向社会史的角度，把会馆置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大环境中，全面考察了会馆发展演进过程及其兴盛的背景，渗入分析会馆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进而全方位、多层次地阐述和论证了会馆的历史地位。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华文化 专题史系列丛书 >>>

◎ 王日根 / 著一

# 中国 会馆 史

中国出版集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获厦门大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资助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会馆史/王日根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7. 7

(中华文化专题史系列丛书)

ISBN 978-7-80186-667-7

I. 中… II. 王… III. 会馆-历史-中国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1894 号

### 中国会馆史

---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360 千

印 张: 14.5 插页: 2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667-7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绪论/1

## 第一章 “源涓流长,有容乃大”

——中国会馆的源流与演进/27

### 第一节 会馆的界定/27

### 第二节 会馆发展演进的阶段性/30

一、会馆前史/30

二、崭露头角/38

三、群星璀璨/46

四、蜕变分化/70

五、趋新转型/87

### 第三节 会馆发展的地域差异性/98

一、首善繁盛/98

二、阗阗喧腾/120

三、墟场景观/132

四、移民乡井/144

五、会馆地域分布的特点/145

### 第四节 会馆的海外扩展/150

一、海外会馆的发展/150

二、海外会馆发展的特点/169

## 第二章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会馆的兴盛背景及内部运作/174

第一节 市场机制与会馆 / 174

一、明清交通的便捷与贩运商业的发展 / 174

二、明清商人与会馆的兴办 / 192

三、商业性会馆的内部运作 / 207

第二节 人口迁移与会馆 / 233

一、明清人口迁移新特点 / 233

二、人口流动与会馆的建设 / 245

第三节 科举制度与会馆 / 263

一、地域政治观念与会馆 / 263

二、明清科举制度与会馆的互动 / 269

第三章 “聚乡人,联旧谊”

——会馆的社会功能 / 289

第一节 明清阶级关系的变化 / 289

一、“四民”观念的模糊化 / 289

二、贫富贵贱的急速转变 / 297

三、阶级利益的明朗化 / 300

第二节 会馆与社会整合 / 303

一、会馆内部整合 / 304

二、会馆与地方社会的整合 / 324

三、会馆与中外文化的整合 / 331

第三节 会馆与政府的关系 / 335

第四章 “敦厚仁恕,保全信义”

——会馆的文化内涵 / 369

第一节 会馆的建筑设置与区位分布 / 370

一、建筑设置 / 370

二、区位分布 / 387

第二节 会馆的神灵崇拜/391

一、会馆的神灵设置/392

二、会馆的神灵脸谱/396

三、会馆神灵崇拜的文化内涵/406

第三节 会馆文化的取向 /409

一、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互渗/409

二、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的交融 /414

三、文化继承与文化更新 /416

结语:由社会变迁反观会馆的历史地位/426

一、会馆与诸种社会组织/426

二、会馆与文化交流、文化融合/434

三、会馆与道德建设、道德维护 /437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444

后记/455

## 绪 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颇具凝聚力的民族,其团体意识自古及今,延续了五千年。对此,前人已在家族制度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但其不足之处是很显然的,一者家族组织无法囊括全部基层社会,家族发展亦非始终一贯,宋以前的家族多是政治上的显赫者,宋以后才有了庶民化的家族的普及形态。再者,家族制度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伴随,它以宗族成员的安土重迁为前提。因此,我们还必须看到家族制度以外的村社制度,看到由此培植起来的乡土观念以及乡土观念的外延形态。中国人并不一定安土重迁,而是颇具流动性;中国人并不仅仅面朝黄土,而且也放眼于蓝色的大海,特别是在宋元以后的各历史时期,人口流动与向外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经济不断传播和发展的主要载体。无论如何,人口流动意味着走向陌生的环境,向外发展则标志着分占别人的资源,这期间势必导致诸多矛盾,如何保存自己,如何协调矛盾,如何求得长久的彼此相安、相助、相利乃至相长,都要求有一种务实的解决途径。由此,会馆这种民间的自发性的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它以乡土为纽带,以传统优良的道德观、价值观为指导,以相互定期与不定期的聚会、娱乐及彼此的互律为活动方式,力图建立起一种和谐稳定,能以不变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万变的社会秩序,从而程度不同地实现了商品经济与道德建设、社会变迁与秩序稳定的平衡发展。明清社会的发展与会馆的建设紧密相连。

人们已普遍认同这样的结论:中国封建社会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主要表现在:(一)中国封建经济呈辐射性地向周边发展,这时常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得以缓和,增设地方行政治所、移

民垦荒等常使经济落后地区呈现出大的发展。王朝中后期的改革运动以及王朝晚期的农民战争得以消解与遏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从而使封建秩序不断得以重建。因而有人称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功能。(二)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不断强化,成为封建生产方式的保护伞。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对社会基层控制的日益间接化,实际上不是中央集权减弱的标志,而是因为社会基层的各级组织集团多把中央王朝的大旨作为自己的宗旨,表面的自治实质上是社会秩序更加稳定的表现。时常发生基层组织与上层政治的矛盾斗争,也只能看作是二者相互关系的调适过程,有时是基层组织对上层政治腐败的抵抗,有时是基层组织对自己能力的过高估计而产生的异动,最后二者仍处于一个共同体中。(三)中国封建社会实施的文化灌输政策是无孔不入的,儒家学说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所共同信奉,从而使现实的人们不断为建构儒家的理想国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向着共同的目标奋发进取。其中,科举制度的实行是一种强有力的推进器,它诱使庶民阶层由此跨入了仕途,又逼使官绅阶层必须由此才能永葆世泽,这便奠定了中国封建秩序长期维持的思想根基。(四)在中国封建社会演进过程中,或因地理条件的差异,或因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变迁,各地政治、经济的发展颇不平衡,这为商品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们习惯把唐宋之际看作传统社会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期。此前,中央政权曾通过控制土地分配抑制社会的两极分化,通过普及基层行政设置来强化社会控制。即使是身在外地的官员一般也以集贤院和邸舍统合之。社会控制的覆盖面是全方位的。在此之后的宋朝政府推行了田制不立的经济政策,更广泛地以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流动,包括人口居住地的流动和社会身份地位的变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动本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却也对固有政治体制提出了挑战。在市场发育过程中,政府的干预虽多强而有力,但覆盖范围终究有限,民间社会进行自我管理的空间便越来越大。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也是以上诸规律得以充分展示的时期。由于政治相对承平,因科举制度和官吏易籍就任制度而激发起来的地域政治观念首先便在官员荟萃的京师发育成长起来。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北京工部主事俞谟便首先把买自路姓的一块房屋基地交由同邑京官晋俭设置芜湖会馆,从而翻开了明清时期会馆建设的第一页。随着明代皇权旁落,内阁时常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京师各地域性的官僚性会馆纷起频出,蔚为风气。如果说其初仅为同籍官僚娱乐宴谈的俱乐场所,那么其后便日益显示出与科举结合的趋势。因而这类会馆无论对明清时期政治,还是对明清各地方文化的发展都曾发生过重要影响。

明清时期经济领域内的变迁更引人注目,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长足进步具备了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厚和更扎实的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地区间经济区域的形成,并且在地区间便利的经济交流中各具分工。封建政府的商业政策、赋役政策的演变使越来越多的人把经商视作改变自己贫贱地位的门径,而社会风俗的演变又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商人们主动通过捐纳、报效、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来赢得社会的认同,也通过代表自己阶层的知识分子的舆论体系来确立自己的社会形象。因而,明清商业便以商品种类繁多、经商人员来源广泛区别于以前各朝,商人成为明清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阶层。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都显示了自己的存在,他们也在力图以自己的意愿去规划社会,寻求在其中的适当位置,跻身于修造会馆是明清商人的重要举措,也寄予了他们的信念追求。

明清社会变迁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是流动性阶层所占比例较大,除了行商之外,移民风潮几乎席卷了农、工、儒等各个阶层。求生、求利、求富既成为移居者的一般心理需求,同时也决定了明清移民活动的多向性与延续性。在移民集中的地区,官方行政机构或尚不完善,或干脆付之阙如,土客矛盾、客客矛盾都可能导致社

会的动荡与不安,而会馆这种主要以地缘为联系组带的基层社会组织因最贴近移民的心理需要便具有了广泛的发展前景。

因此,明清会馆是多种形态并存的,加入兴办会馆行列的主要有官绅、商人以及其他移民,其存在范围从京师至于穷乡僻壤。有的地区密集,有的地区则稀疏;有的会馆雕梁画栋,檐宇连绵,规模至为恢弘,有的会馆则构屋随便,孤房独室,显得十分简陋。

但是,会馆的最基本特征在于它的同乡籍性和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性。其主要功能就在于为同乡籍的流移者提供服务,实施管理。本书将从社会史的角度,着重讨论明清以来的会馆组织与社会变迁问题。会馆组织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迁的产物,同时又反作用于整个社会,把明清会馆与明清时期的市场机制、人口迁移、科举制度等重大事象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将有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把握明清社会的运作机制,认识明清社会的变动趋向。

当然,作为一项科学的研究,必须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所以我们有必要作一个大体的学术史回顾与评述。

关于明清会馆的研究,大体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5月,郑鸿笙发表了《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sup>①</sup>,似为会馆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他认为会馆、公所与一般社团不同,它们规定入会者须交纳会费和认捐一定数额的钱款,以作基金;又与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团体不同,同乡团体的会产是专用于祭扫、享宴和慈善公益事业,因而它具有财产团体和公益团体的双重性质。实际上,作者所言的会馆公所是民国时期部分会馆公所的情况,从中并不能让人了解会馆公所演变与发展的全貌。

30~40年代,有一批学者致力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像陶希圣、潘光旦等人关注家族问题一样,窦季良等人则更多地注重诸如

<sup>①</sup> 《国闻周报》第2卷第19期(1925年5月)。

会馆这类同乡性社会组织的研究。窦氏的《同乡组织的研究》<sup>①</sup>从乡土观念(观念培成、层次扩延、分割局面、自然趋势)、组织演化(组织渊源、制度完成、鼎盛时期、新体蜕化)、集体象征(自然选择、类型演进、制度凝固、新兴意识)、功能分析(创建时期、渐盛时期、寝假衰微、功能转化)等方面对包括会馆在内的同乡组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堪称会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里程碑。不过,因为作者所做的研究多集中于四川地区,因而主要是移民会馆的研究,对于诸如北京、上海、苏州等大都市中的会馆缺乏讨论,而且,作者囿于四川一隅,也没有从整个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会馆问题,因而他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有的即使用于四川也有失偏颇,因而其缺憾是很明显的。

到50年代,随着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会馆问题,在众多的论述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中,较多论者干脆把它比附欧洲资本主义前期的商业基尔特。把会馆在明清时期的较大发展看作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前提。在早期,无论是李文治先生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sup>②</sup>,还是彭泽益先生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sup>③</sup>,几乎都把会馆作为行会组织看待,这当然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关,这种认识在后来也有所修正。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批史学工作者又不断拓展资料领域,并在整理碑刻及其他文献资料方面做了许多扎实的调查工作。有关会馆方面的几本资料集奠定了其后会馆史研究的资料基础,同时也规范了会馆研究者的思维,人们几乎都较多地着眼于会馆的经济意义而不及其他,这样,视野就被大大地

①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正中书局1945年版。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

限制了。如今,当我们重新翻检这几部资料集<sup>①</sup>时,发现有许多为当时人所忽视的字句实际上包含了更深刻的社会变迁意义。由于资料集的编者多注重资料的完整性,所以为我们的重新研究仍能提供许多有意义的资料。

从50年代到80年代,会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框架下进行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sup>②</sup>、洪焕椿《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和作用——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之一》<sup>③</sup>、雷大受《漫谈北京的会馆》<sup>④</sup>、顾延培《上海最早的会馆——商船会馆》<sup>⑤</sup>、贺海《北京的工商业会馆》<sup>⑥</sup>等。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把会馆视作工商业行会,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提供资料依据。胡如雷先生甚至认为:“明清之际,我国才真正形成了类似西方行会的工商业组织,或称会馆,或称公所,或称行,或称帮。”<sup>⑦</sup>他径直把行会、会馆、公所、行、帮都划上等号。汪士信先生认为明清商人会馆经历了从会馆到公所的过渡,它们是中国式的行会。<sup>⑧</sup>应该说,这些论点作为一个时代思想的表露实际上也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到1982年,吕作燮发表了《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

① 它们包括:《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业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③ 《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④ 《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⑤ 《中国财贸报》1981年5月16日。

⑥ 《北京日报》1981年11月27日。

⑦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1页。

⑧ 汪士信:《论明清商人会馆》,《平准学刊》第3辑下册;《我国手工业行会的产生、性质及其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2辑。

会》<sup>①</sup>一文,成为对过去研究之片面性的一种反拨,实具振聋发聩之效。它启示人们重新思考会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团体的社会意义。1984年,吕作燮又发表了《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sup>②</sup>一文,阐述了自己对会馆与公所的区别的认识,再次给人们以反思的激励。同时,吕氏还发表《南京会馆小志》<sup>③</sup>,在南京会馆资料征集方面做了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工作。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赞同日本学者的西欧行会等于中国的“行”的看法,认为早期会馆与工商业毫无关联,对过去被认为是北京工商业会馆的会馆作了辨析,认为单就纯商业性会馆计算,总共是21所,占北京会馆总数的5%弱,而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工商会馆,仅占北京会馆总数的2%强。从比例上看来,北京工商业会馆只占少数,而具有行业性行会特点的工商业会馆则更占少数。故“将北京的会馆或部分工商会馆与行会等同起来,是缺乏根据,特别将会馆与后来的同业公会等同起来,那就近乎荒谬的了”。作者又以苏州、汉口、上海作为代表分析了工商重镇的工商业会馆,认为见于这些城市的行业性会馆多属于地域性行帮组织,而在四川各县乡镇出现的会馆则是移民会馆。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列举了苏州会馆公所名称与分布,指出前者具有地域的特点、外来的特点、帮派的特点和松散联合的特点,会馆只能由乡绅、官僚或商人中的头面人物才能创建,而公所与会馆相比则显示出行业的特点、商业的特点和联合比较严密的特点。这一结论在其后引起争论,持否定态度的人发现,一者因为各地有各地自然情况的不同,再者两个概念经常无法区分的现象也确实多有存在。

徐鼎新认为:上海的同乡团体含有一定程度的同业组合的因素,而同业团体中又形成若干地域帮口。开埠以后,上海同乡团体

① 《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②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③ 《南京史志》1984年第5期。

发生的分化和组合,反映了近代各商帮力量的消长,同业团体的变化则表现为新型行业团体的出现,其结构打破了狭隘的地域界限和旧有行业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乡谊联系和行会束缚。近代上海同业团体的近代化过程是缓慢的,到20世纪初,会馆、公所等传统组织少数演化为纯同乡团体,而大多数改组为同业公会(联合会)。<sup>①</sup>王笛对近代重庆城市社会组织的研究表明,重庆的会馆、同业行会和公所也体现了同乡与同业双重组合的结构特征。以会馆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设立是移民适应城市新环境的需要。会馆是同籍移民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既可以联络感情、沟通消息,又可以为他们解决许多实际困难,在与土著居民发生矛盾和摩擦时,还可以维护移民的利益。后来,会馆逐渐发展成为在政治、宗教、社会等方面对整个城市都有相当影响的组织,会馆首领“八省首事几乎参与了涉及城市管理和建设的各项事务。”<sup>②</sup>二者的研究都认为会馆与公所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方志远认为会馆和公所二者有递进的关系。会馆是起始的名称,公所是继起的名称。会馆者,聚会之馆舍,叙的是乡情友谊,气氛应是宽松的;公所者,公议之场所,议的是利益分配,气氛则是严峻的。<sup>③</sup>

近期以来,会馆已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重视,除了前些年陆续问世的几部近代城市史涉及会馆之外,这方面的论文也不断涌现。如刘正刚《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sup>④</sup>、《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经济活动》<sup>⑤</sup>、陈连营《客商与清代河南农村经济》<sup>⑥</sup>、萧云玲《论明清

- ① 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见《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
- ② 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城市史研究》第5辑。参见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六章。
- ③ 方志远:《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4页。
- ④ 《清史研究》1991年第4期。
- ⑤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 ⑥ 《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

会馆的宗族性、地缘性、官府性及其他》<sup>①</sup>、陈忠平《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sup>②</sup>、蔡鸿生《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苏州清碑〈潮州会馆记〉释证及推论》<sup>③</sup>等论文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及会馆。再有林国平《福建科举会馆的兴衰嬗变及其原因》<sup>④</sup>、王民、林国平《明清两代北京闽中会馆的教育职能及其演变》<sup>⑤</sup>和乐正《城市结构功能的近代变迁》<sup>⑥</sup>值得一提，前二文把北京的福建会馆作了分阶段的论述，指出北京闽中会馆的兴衰与政局稳定与否、京都的设置与迁移和科举的兴废、地方文化发展、经济来源及管理人员的优劣密切相关。北京闽中会馆为福建科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会馆在近代社会变迁中能建立京师闽学堂、宣南法政专门学校、春明女子中学等以适应时势的发展，但因这种适应多是被动应付式的，故会馆也呈现出衰落局面。乐正则认为会馆公所发展至近代，仍然继续发挥其有效作用，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有积极意义。近年来许檀、刘风云、王云、李刚、宋伦、涂上飏、李芳菊等学者在市镇研究中亦大量涉及会馆，如刘风云还专门研究了明清城市的文化空间，确立了会馆在这一空间的作用。<sup>⑦</sup>

① 《江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②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潮汕文化论丛》（初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④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2年第1期。

⑤ 《教育评论》1991年第2期。

⑥ 《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1期。

⑦ 这方面的成果有：刘风云：《明清城市的文化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等。

有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在研究商会问题时追溯及会馆,有的把会馆到商会的演变看成是新的取代旧的的自然过程,有的认为会馆与商会之间虽然名称各异,但内部共性颇多,而且商会的出现并没有宣布会馆的消亡,有的说会馆是同乡性的,商业是同业性的,会馆是松散的联合,而商会则有严密的组织性。<sup>①</sup>实际上,商会是近代西方的舶来品,其移植中国或可以有“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之可能,或也会出现“削足适履”的不适应。继续探讨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还见到过去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表明过自己对会馆的看法。早在20世纪50年代,傅衣凌就在《明清农村社会经济》<sup>②</sup>一书中讨论到江西兴国的抗租会馆,反映了作者对明清社会诸多特殊现象早就有所关注,并做了较精当的分析和概述。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sup>③</sup>中也提出了客商落籍后成为坐贾继而发起设立商人会馆的观点。再如段本洛、张福圻分析了苏州手工业会馆<sup>④</sup>,韩大成补足了几条明前中期的会馆资料<sup>⑤</sup>。蒋兆成认识到杭嘉湖地区存在商人会馆向手工业会馆转化的趋势<sup>⑥</sup>。这些都极有价值。李华、陈学文等对地方性商人的研究中亦多涉及会馆问题,他们较多地致力于收集资料,并时有灼见,是我们进一步研究会馆问题的重要材料。近年来,罗一星在《珠江三角洲

①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形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

③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 段本洛、张福圻:《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⑤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⑥ 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sup>①</sup>中就佛山会馆展开了论述,指出佛山会馆包括手工业会馆和商业会馆,手工业会馆中出现了东家行、西家行的分野,乡仕会馆的设立则表明会馆组织在明清佛山的社会整合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刘正刚在《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sup>②</sup>中集中阐述了清代四川闽粤移民会馆的设置、分布、建筑规模和社会功能。还有严昌洪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sup>③</sup>中也提出了自己对会馆公所的看法,他指出:会馆公所是封建时代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城市繁荣、人口流动量增加的产物,特别是经济领域里的变化为会馆、公所的建立既提出了需要,又提供了可能。不应以会馆或公所的名称来区分这类社会组织的性质,应该按各个组织的组建动机、人员构成、活动内容来确定其性质,是同乡会还是行会,是商人组织还是手工业组织,或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它一般都具有“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项功能,有的会馆还为会员伸张正义、代办冤狱,以集体力量谋求官府出面保护。延至近代,会馆传统的慈善事宜已降到次要地位,而切磋智识才能,即研究商务、交流商情、提高商智、培养商才则成为会馆的重要职能。研究商情商务使会馆成为商战阵地,政治参与意识的加强使会馆的作用范围有所开拓,会馆兼办教育使会馆更增加了新的功能。这显然主要是从经济意义上的会馆立论的。还应提到的如冯尔康等著《清人社会生活》<sup>④</sup>、朱英著《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sup>⑤</sup>等都有关于会馆的专门论述。

综而论之,中国内地几十年的会馆研究在如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各地会馆资料的征集出版为今后的会馆研究提

①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2年4月。

②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3年4月。

③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⑤ 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